

中国国家起源

高光晶 著

作者
赠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家起源

高光晶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 国家 起源

高 光 磊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矿山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1787×1168毫米 印张: 10.16 字数: 23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序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的理论问题，以及具体论断问题，建国以来史学界虽有过不少的研讨，但尚多争议，不易深入和解决。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说中关于东方国家形成的始点、途径、道路、特点等基本原理，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并未根据东方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因而在这一方面就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和创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尽快地改变这一局面。

近年来，高光晶先生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东西方国家起源的理论入手，根据古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结合我国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出土文物等多方面广博资料进行剖析，具体探索我国国家起源的历史实际，写成《中国国家起源》一书，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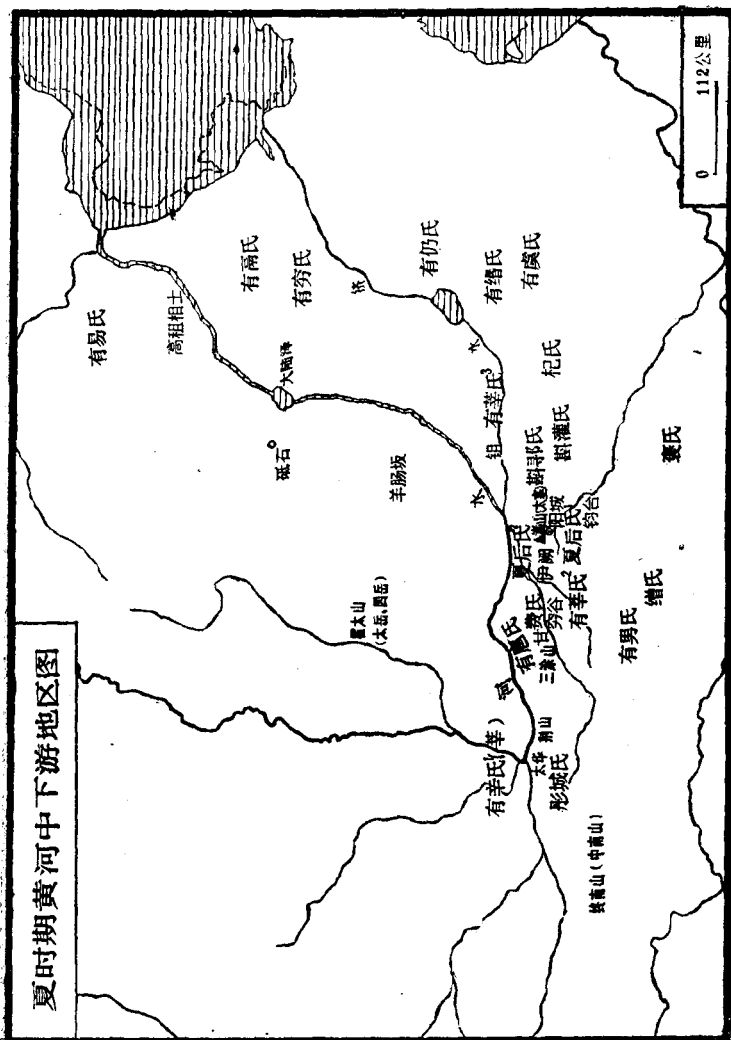
大家知道，“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其原因是因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条件不同，其结果必然导致各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影响到各民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出各民族社会发展上的速度和途径的差异，从而影响和决定其国家的起源。高光晶先生认为古代中国建立国家是以氏族公社作为社会基础的，氏族既是血缘组织，又被作为国家的行政区划。中国社会历史进入夏代时，其最高统治者启便建立了国家政权，是为我国国家起源之肇始。作者在本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以及中国国家起源的原因和途径等问题，指出古希腊、罗马所处的地理环境需要铁器工具的开发，所以直到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经济和私有制得到

充分发展才建立国家。可是，古代中国则不同，它在优越的地理环境里，仅用木石工具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一定的剩余产品，尤其是因为治水需要集体的力量而组织部落联盟，然后转化发展为国家。同时，由于古希腊、罗马与东方形态的中国的各自特点而产生不同的政体。这些看法是值得注意的。学术问题进行争议是好事。高光鼎先生能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说，供学术界共同研讨，更是好事。本书是有关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它的问世，必将推进中国国家起源和具体论断问题的研讨，故予乐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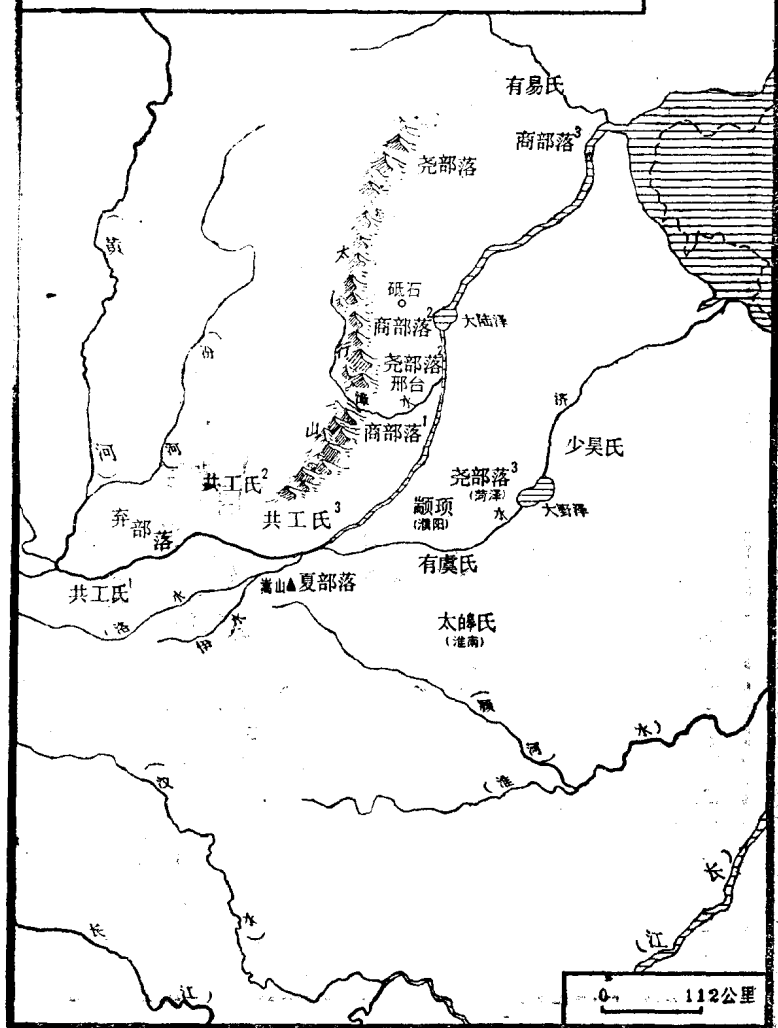
吴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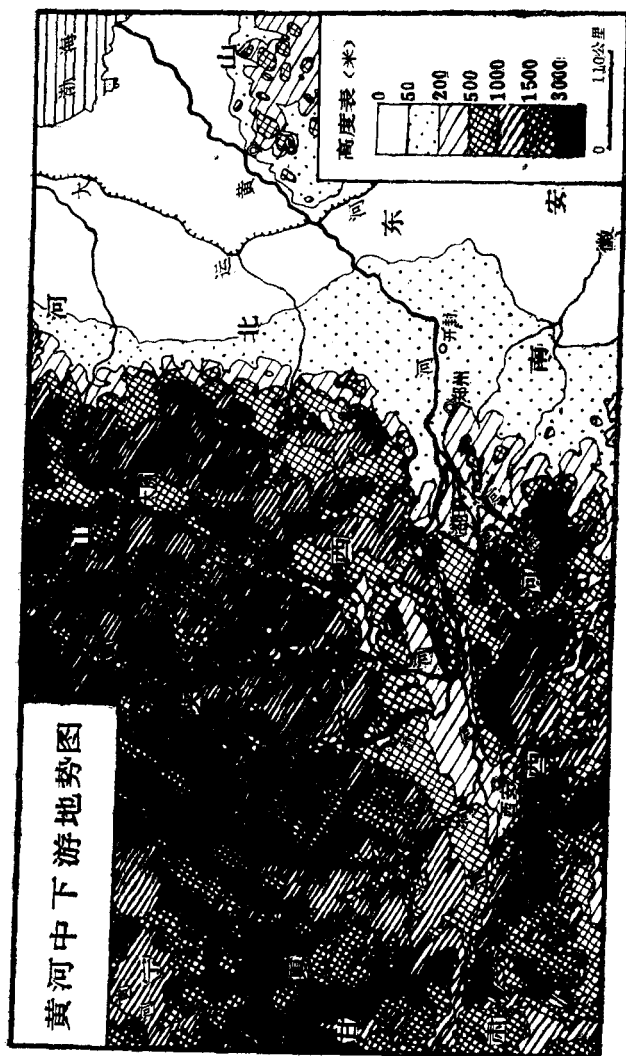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夏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图



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氏族部落分布图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关于史料的处理.....	(1)
第二节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一些 问题.....	(9)
第三节 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	(20)
上篇 中国国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	
第一章 古代中原地区的经济.....	(31)
第一节 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	(31)
第二节 中原地区农业的产生.....	(38)
第三节 氏族公社时期农业的缓慢发展.....	(46)
第四节 冶铜业的出现.....	(49)
第二章 氏族、氏族部落.....	(54)
第一节 图腾崇拜.....	(54)
第二节 名称的改换.....	(57)
第三节 氏族部落阶段.....	(64)
第三章 黄河中下游分布的氏族部落.....	(78)
第一节 黄帝族.....	(78)
第二节 炎帝族.....	(90)
第三节 东夷族.....	(94)
第四章 以防治水患为首要任务的部落联盟.....	(106)
第一节 尧、舜时期洪水成灾的原因.....	(106)
第二节 部落联盟的形成.....	(109)
第三节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	(113)
第五章 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134)

第一节	夏启用暴力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和建立夏国家·····	(134)
第二节	夏代的国家机器·····	(145)
第三节	夏国家的巩固·····	(170)
下篇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中的特点		
第一章	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单一性·····	(176)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176)
第二节	古代中国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	(179)
第二章	古代中国建立国家是以氏族公社为社会基础·····	(197)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	(197)
第二节	古代中国国家的社会基础是氏族公社·····	(209)
第三章	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制·····	(218)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的土地是私有·····	(218)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国有·····	(221)
第四章	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241)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制·····	(241)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	(250)
第五章	古代中国地方的封国制·····	(265)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按地区划分国民”·····	(265)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封藩建国”·····	(268)
第六章	古代中国至高无上的神权·····	(287)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的“人神同形”·····	(287)
第二节	古代中国“天”(上帝)的绝对权威·····	(293)
结束语	·····	(303)
后记	·····	(313)

绪 论

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但是“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①

不言而喻，恩格斯在这里是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言的。然而，各民族的历史虽有其共同性，但也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来探讨其国家的产生及其特点。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过程和特点，长期以来，史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究其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于史料的处理问题；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问题；第三，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作用的估价问题。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是弄清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的前提。故就研讨所得，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之前，我们先就这三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节 关于史料的处理

一、有关的史料

反映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史料，大致有以下几种：

1. 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有《尚书》、《诗经》、《左传》、《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先秦诸子著作，历史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和夏、商的传说。

2. 地下的文字纪录。如商后期和周初的甲骨文，商、

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

3. 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各种器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居住村落和墓葬制度等。①

但是，这些史料中，甲骨文多为占卜的“卜辞”；金文也大多是记功之辞；考古发掘的实物，需要文字记载相印证。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后人根据传闻的追叙。有的甚至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对古代传闻歪曲的记叙和托古编撰的伪书。因此，这些史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就《尚书》而言，后世学者多认为“尚”是“上”的同义字，《尚书》就是记载“上古之事”的书。王国维先生认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具体而论，“《虞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商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人所作。至《商书》中之《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皆当时所作也。”②马雍先生也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中的文献资料并不完全是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直接的档案文献。另一部分是后代人所追叙的古史传说，还有一部分是时代更晚的人故意伪造的作品。”③“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虞书》和《夏书》六篇文献（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禹贡》、《甘誓》）都不是虞代和夏代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时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④不过，他也把《盘庚篇》看作是当时人的作品。他说：“就目前的一般看法而言，其中最古的真实史料是记载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盘庚篇》并不一定就是盘

庚时期的作品，它可能是时代稍晚的史官所写的。”^⑥但与甲骨文字和商代青铜铭文相对照，马雍先生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甲骨文除了“卜辞”所记载的事实性质不同外，与《尚书》中的《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比较，在文体的繁简和篇幅的长短上，都不相似。甲骨文中没有一篇有上百的文字，商末的青铜铭文也只有四十五字，^⑦可是作于商代中期的《盘庚》三篇，却有一千二百八十三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盘庚篇》是否是当时人的作品，因为作为处于“文字构造的途中”或文字“基本成熟”^⑧的商代，是无法写出这样文字繁缛的作品，应该是由后人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材料或传说，加工追叙的。陈梦家先生说：《盘庚篇》“与《汤誓》皆有‘天命’之语，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之说法。”^⑨而“此篇有‘王若曰’之语，此西周中叶史官代王宣命之制，商人不应有之。今天《盘庚》三篇共1283字，较之《周书》中之命书更长。晚殷金文，长者不过数十字，如何在盘庚之时有如此巨作？此篇与上述《甘誓》、《汤誓》皆较《周书》易读，两誓为战国时拟作，此亦战国末人之拟作，犹《商颂》矣！”^⑩

《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甘誓》、《汤誓》等篇，虽然都叙述了尧、舜、禹时期的传说，但其中所体现的大一统观念，是战国晚期才出现的，这些篇章显然是根据当时所出现的政治上大一统的趋势而编写的。

其它如《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左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都是战国人所作。

二、史学界对史料的态度

在解放前，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

和考古工作的局限，不能为史学界解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上当时的史学工作者大多未能掌握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理论作指导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有的学者对中国史前时期，甚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避而不谈或存疑。如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就是从秦统一开始的，对秦以前的历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谈到：“若论远古，则杨朱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无；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经传所传，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征于金石、龟甲，所得甚渺，毋宁付之阙如。”夏曾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中，也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传疑时代”。

即使当时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对中国史前时期和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也还处在探索之初，尚不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实面貌。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指出：“在商代都还只是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社会，那是可以断言的。”又说：“总之，中国的历史是在商代才开幕，商代的产业是以牧畜为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①

一九四四年，吴泽先生在《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序》中说：“关于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古代阶段，至今各家意见，尚未完全一致，郭沫若氏原以殷代为氏族社会，周代是古代社会，近来，渐有改认殷代为古代社会的趋向；惟侯外庐氏等，仍承郭氏原见，深值研究。吕振羽、翦伯赞诸氏与作者，均以殷代为古代奴隶社会，殷前的夏代为史前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后的周代是中世封建制社会。”^②

一九四九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渐趋成熟，广大史学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在诸

多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因资料不足，未能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除历史教科书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⑬的意见作为根据，以确定中国阶级社会从夏朝开始外，一般史著对夏代的社会性质，多因史料不足而存疑。如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指出：“殷代以前的夏代，尚有待于地下发掘物的确切证明。”又说：“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⑭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夏朝虽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和产生了阶级，但“不能把夏朝看作奴隶国家已经完全建立，只能看作原始公社正在向奴隶制度国家过渡。”所以“商社会由百姓（包括贵族与自由民）与民（包括宰与各种类奴隶）两大阶级构成，可以确定为奴隶社会。”^⑮而王玉哲先生的《中国上古史纲》却认为，不仅是夏代，就是商前期也还是原始社会的逐渐瓦解时期，在盘庚迁都时才出现奴隶制度和形成国家。

近年来，学者们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上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金景芳先生在《谈谈中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禹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最后的一个民主首领，而启则是奴隶社会最初的一个专制君主。”又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创者是启而不是禹。启开辟了中国奴隶社会的新纪元。”^⑯赵希鼎先生认为中国国家的形成是夏代。他在《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证了夏代国家机器的产生。^⑰但有人说，中国国家的形成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如唐兰先生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他认为：首先是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十分突出，有一个墓

葬有一百八十多件随葬品；随葬品中有很多贵重的器物，如象牙器，但有些墓则一无所有。这种现象不能认为还是无阶级社会。其次是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目前尽管只发现六个，但这种文字已规范化，更重要的是已经有了简体字。这说明它们是一种“已经很进步的文字。”^⑮正是这种“颇为进步的文字，就是这时已经是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重要证据。”^⑯因此，唐兰先生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应该远在五、六千年以前。

不过，也有不同意唐兰先生意见的。陈国强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所反映的经济状况是农业与手工业还没有分工，墓葬方面是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阶段，以及氏族墓地的墓葬反映的贫富分化只能是父系氏族社会等理由，来说明大汶口文化“还属于家长制家庭的父系氏族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⑰黎家芳、高广仁等先生认为：“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原始文字，寥寥数字，虽不是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但它至少是一个文明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它已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⑱彭邦炯、苏凤书、丁季华等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属于氏族社会末期，还不是奴隶社会。^⑲

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分歧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因为一般说来，史学工作者侧重于文献资料，认为考古资料是实物，有其局限性；可是考古工作者偏爱于考古资料，而认为文献资料如《尚书》、《诗经》、《左传》，以及《山海经》等有关夏代前后的记载，或者是神话传说，或者是后人的追叙，因而对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不免有些怀疑。为了避免治学欠严谨之嫌，对这些史料的引用就必然过于谨慎，甚至

不敢问津。

其实，古代的神话传说，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③《尚书》记载的神话传说，虽然不免渗杂了一些后人的想象和附会，但它大都是以古代的素材作为根据追叙的。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其杂有后人的想象与附会，就完全否认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我们认为，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本着科学的态度，对神话传说进行辨正，作到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完全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诚然，要从这些或明或暗的神话传说中获取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有价值的史料，实非易事，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则是我们解开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谜的钥匙，同样要求我们去掌握。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②参看吴恩裕：《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二章，载《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第265页。

④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⑤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页。

⑥《〈尚书〉史话》第2页。《书序》认为：《盘庚篇》是盘庚时的记